



李浩 著

唐代三大地域 文学士族研究

本书主要考察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全书分三编，上编为总论，中编为分论，下编为个案研究。作者提出“唐代三大地域”与“唐代文学士族”的概念，并将文学士族这一特殊的文人群体置于地域文化背景上，运用“地域——家族”的研究策略，对文学士族发荣滋长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作互动分析。对与文学士族相关的贤能标准、陈寅恪士族理论、诗赋取士、士族教育、士族婚姻与信仰等问题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纵深开拓。作者用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地理学的成果来激活文学史研究的创新思维，拓展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学术史的反思与问题意识并重，一般概括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对唐代文学研究本身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中華書局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李 浩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李浩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580-9

I. 唐… II. 李…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6008号

责任编辑:顾青

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李浩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1³/₄ 印张·234千字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19.00元

ISBN 7-101-03580-9/I·452

序

章培恒

文学的地域研究，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在中国这样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里，尤其如此。这是因为：不仅各地区的文学各有自己的特点，彼此的差别有时十分巨大；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的力量的消长，也常常会导致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变化。所以，如果没有关于文学的深入的地域研究，就既难以具体说明我国各个时期的文学的面貌，也不易说清我国文学演变的确切原因。

然而，文学的地域研究却又难度甚大。一方面固然要对其所研究的地区的文学及其相关的各领域作较全面细致的钻研，同时又要在整体上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有全局在胸；若无后者，是无法真正了解地区性的文学特色的，所谓不知同，焉知异？也就是说，就其微观的研究而言，时时有必须细入毫芒之处；就其宏观的研究而论，则又要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难度既高，从事者自然就少。加以社会环境——从外患频仍到十年浩劫——又为学术事业带来种种限制，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在我国几乎还没有真正

开展起来。从八十年代起，才缓慢地启动，但人数仍然极少，有的研究者后来又忙于别的课题，开了个不坏的头，就舍弃——至少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舍弃了，不见再有新的成果。

在这领域内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并不断有优秀论著公诸于世的，我想，李浩先生是颇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9 年版）等一系列论著都是视角新颖、材料丰富的有见解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由于他对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全面关心和深入其中的研讨，这种地域性研究并不限于一隅，而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起到窥豹一斑的作用。

他现在所完成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则是其以前的研究的综合、扩大和深化。换言之，是在综合其已有的发现、认识的基础上，扩大其研究范围，进一步深入地揭示这三个地域的文学士族的情状和特点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文学上的独特性。我认为，这对李浩先生自己的研究来说，固然是更上一层楼，对于我国的文学地域研究来说，也是一种当之无愧的突破，如同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对李浩先生当时作为出站报告提出的这部专著的评价所述：

李浩博士的出站报告《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按：原题为《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重点的考察》），系上、中、下三编十四章，共三十万字，以“地域”与“士

族”为研究视点，从多学科交叉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激活文学研究，在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上提出不少有益的独到见解，是篇出色的学术论文，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专家组全票评为优等。

作者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善于从大量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尤能从无疑处质疑，廓清许多积非成“是”之点（如陈寅恪先生观点的误读，“以诗取士”的曲解等）。也重视学术史研究，在系统梳理本课题已有研究成果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研究的主旨和方向，力拓思路，提出新见（如从前贤对士族研究的成果中，提出并论证“文学士族”新概念等）。本文文献信息量密集，工作量亦甚巨大，努力于文本分析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表现出踏实细致的学风。叙次明晰，语言流畅，颇有文采，并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个别章节如能再作进一步展开与补充，论文当更精彩。

把这一部书和其以前的论著相较，可以看出李浩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明显的计划性的；在唐代文学的地域研究的漫长道路上，他正胸有成竹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进。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曾致慨于自己的年将不惑，而在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值得羡慕的资本。只要不满足于已有收获，不断地汲取和融合新知，不倦地探索、否定和奋进，接着而来的在这领域里的贡献将是不可限量的。

2002年9月

序

王水照

李浩君在 1999 年秋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本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就是他两历寒暑、辛勤耕耘的成果。在进站以前，他已先后出版《唐诗的美学诠释》、《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诗史之际——唐代文学发微》、《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多部论著，在他自己的治学道路上留下坚实明晰而又逐层攀登的印迹，也为本书的撰作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本书不是他前此成果、特别是《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的简单延伸，而是在理论观念、学术视野、文献占有与考辨、研究方法与手段诸方面的一个突进性的发展。从他个人治学历程而言，本书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所已达到的颇为成熟的学术境界；而对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我国古代文史之学来说，也提供了不少值得思索、参考的内容。

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多样化，对文学的本体特征及其边界的认识反而有些模糊起来，但这正酝酿着突破的契机。许多学者感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策略处处显得捉襟见肘，似已难乎为继，而越来越关注于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以扩展学科发展的空间。

近来我审读过的不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也呈现出这种倾向。其中，从地缘、血缘、学缘等关系上研究古代文学就是常取的视角，这对更具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学术格局的形成，是一种有力的促进，也是对传统“出文入史”、文史结合的学术传统的宏扬，我认为这应予肯定与提倡。

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研究，前辈学者均有涉及，提出过不少精辟的见解，陈寅恪先生尤为鲜明地标举“地域——家族”的研究观念，并用以具体考察唐代制度、政治与文学，成为他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且初具理论形态。近二十多年来，在英美汉学家中，对此似又聚集成一个学术兴趣点，也颇堪注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郝若贝教授（Robert M. Hartwell）曾有《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变》长文，在1980年秋在北京学术会议上宣读。此文考察从中唐到明中期800年间的人口、政治和社会面貌的“戏剧性改变”，详细研究“区域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尤其着重于从“家族”角度来研究“政治精英的转变”。这一研究思路在其他英美学者的论著中继续得到发展，如李浩君在本书提到的伊佩霞、姜士彬、戴维·约翰逊、包弼德等学者的著作，他们阐述的有关历史地理学、地缘文化学、社会学史的一系列观念以及具体史实的考论，已逐渐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因此，李浩君的这部新著，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唐代士族的崛起、分布、流动、衰落及相互间的冲突、交融、整合的历史过程，并进而概括其基本特征，探讨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正好“预流”于目前“地域——家族”研究的学术热潮。本书所表达的独特观察、思考和具体结论，当能深化和丰富这一课题的

研究，并与国内外学者进行有益的学术对话。

原创性是研究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一切学术成果的生命。本书作者好学深思，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善于从大量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拓思路，提出新见；同时重视学术史研究，在全面梳理本课题已有成果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研究的主旨和方向，使自己的研究汇入本课题的学术史序列之中，其创新点既来源有自，又坚确可信。如一般认为，隋唐时士族已趋衰微，坠没湮灭之势不可遏阻，本书作者从士族演进的客观进程着眼，结合文本分析与文献考证，提出并论证唐代“文学士族”新概念，以与东汉时的“经学世家”、两晋南北朝时的“门阀世族”等概念相对应，并认为“文学”之于六朝士族是一种修养，而于唐代士族则变成了一种工具。又如唐代政治上的大一统，地域上的四海混一，由此带来文学和文风上的南北交流与融合，这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定论，然而作者经过仔细考察，指出唐代在政治上、地域上的统一，既没有改变自然地理的风貌，也没有消除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而文学的地域差别依然存在，可谓大唐之音，和而不同。这些都是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也为全书立论找到理论支撑。还应指出，作者思致敏锐而又精细，能从无疑处质疑，廓清诸多积非成“是”的看法，如对陈寅恪先生士族理论的长期误读，对唐代“以诗取士”的某些曲解，也都能别白有据，剖析入理，对这些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解深入一步。

本书由上、中、下三编十四章构成，共二十多万字。上编共六章为总论，综述唐代地域文化与文学士族；中编共五

章为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题阐释；下编共三章为个案研究，主要对河东裴氏家族的迁徙、婚姻及佛教信仰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这样的章节设置，服从于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心得，不追求形式上的全面系统，有时甚至稍有突兀之感（如“寡母教孤”章），但仍存在内在学理上的统一性和逻辑性。至于行文流畅，不支不蔓，每章开端提出问题，又以简短结论殿后，论旨显豁，读来纲目犁然，趣味盎然，表现出良好的学风和文字表达功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是身处长安的杜甫对漫游江南的李白所表达的怀念与期盼。我与李浩君如今也“渭北”“江东”，睽违东西，但也希望他能抓住年富力强、学术势头正旺的大好时机，努力不懈，再出新成果，等待“重与论文”的一天！

2002. 7. 16

目 录

序 (章培恒)	(1)
序 (王水照)	(5)
绪 论	(1)
一 本书所拟讨论问题的设定	(3)
二 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10)
三 基本理论与方法	(19)
四 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	(23)

上 编 总 论

第一章 唐代三大地域与三大文化中心	(29)
一 三大地域概念的提出	(31)
二 三大地域的区域文化特色	(38)
三 三大文化区域与文化网络	(50)
四 统一帝国中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差异	(54)
第二章 唐代三大地域的文学风貌	(59)

一	文学的地域特色	(59)
二	文体的地域差别	(68)
三	文人的地域分布	(70)
四	关于三大地域文学独特性的重新思考	(75)
第三章	唐代文学士族的演生	(80)
一	“文学士族”的界定	(80)
二	唐代文献中的所谓“清流”	(83)
三	衣冠及衣冠户	(95)
四	四姓、五姓、七姓与郡姓	(98)
第四章	唐代文学士族的地域构成	(105)
一	关中士族群体	(106)
二	胡姓士族群体	(117)
三	山东士族群体	(123)
四	江南士族群体	(131)
五	三大地域文学群体的比较	(138)
第五章	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	(144)
一	科举仕进所形成的流动	(145)
二	战争所造成的移民	(153)
三	贬谪与宦游所形成的迁徙	(162)
四	士族迁徙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164)
第六章	唐代文学士族与贤能标准	(174)
一	唐人对贤能标准的争论与分歧	(175)
二	贤能标准的变迁	(192)
三	贤能标准的得失与评价	(197)

中 编 分 论

第七章	《隋书》中的文化地理观 ·····	(207)
一	从《隋书·文学传》序谈起·····	(207)
二	《隋书·儒林传》中的学术地域观·····	(212)
三	《隋书·地理志》中的地域文化思想·····	(218)
第八章	陈寅恪士族理论的被误读 ·····	(226)
一	陈氏士族理论的主要内容·····	(226)
二	学术界有关士族研究的趋向·····	(230)
三	有意的误读与无意的扭曲·····	(232)
第九章	从“关中本位政策”到“科举制” ·····	(236)
一	从“文武合一”到“文武分途”·····	(239)
二	从“文武分途”到“文学取士”·····	(241)
第十章	“诗赋取士”说平议 ·····	(246)
一	“诗赋取士”说法的由来·····	(246)
二	唐人对“诗赋取士”的批评·····	(251)
三	“诗赋取士”的重新评价·····	(254)
第十一章	寡母教孤：唐代士族教育的一个突出	
	现象的考察与分析 ·····	(266)
一	有关寡母教孤的资料·····	(266)
二	寡母及孤子之族姓考察·····	(269)
三	寡母教孤的教育学分析·····	(273)
四	寡母教孤的心理学分析·····	(276)

下编 个案研究

第十二章 墓志所见唐代裴氏婚姻关系·····	(281)
一 与皇室通婚·····	(282)
二 与关中士族通婚·····	(285)
三 与山东士族通婚·····	(288)
四 与代北胡姓通婚·····	(292)
五 与江南士族通婚·····	(294)
六 与其他家族通婚·····	(296)
第十三章 从碑志看唐代河东裴氏的迁徙·····	(298)
一 有关河东裴氏丧葬及迁徙的史料·····	(299)
二 裴氏归葬及迁徙地的统计·····	(308)
三 统计结果的分析·····	(312)
第十四章 裴氏与佛教信仰·····	(319)
一 裴氏家族成员对佛教的弘阐·····	(320)
二 裴氏家族女性对佛教的修持·····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28)
后记·····	(346)

绪 论

唐代文学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最为璀璨绚丽的一颗明珠，二十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也是古代文学断代研究中创获最多、成就最突出的一段，差堪与那个伟大时代相媲美。举凡作品总集与别集的辑佚、校勘、笺注，作家身世、交游、行踪的考证与诗文系年，都有高品位的成果问世；除了对大家、名家的精细深入研究外，研究者对构成唐代恢弘壮丽交响曲的多重声部——中小作家，亦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显示出唐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敦煌与吐鲁番遗物的重新发现^①，无疑为唐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境；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使总集的辑佚整理永远有遗珠之憾，无法划上圆满的句号。贪“大”求“全”的学人，面对神域之内唐文献的不断出土，恐很难实现其“全”的梦想。近二十年来，各类文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文论范畴与语词的梳理、文学史的新撰写，都有突破性的成果行世。随着唐史与唐代文化相关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启发学人们将文学研究与科举制度、铨选制度、教育制度、方镇使府、中西交

^① 文物考古界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有“五大发现”于学术文化影响最巨大，这五大发现分别是“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五大发现中有三大发现与唐研究有关。

通、园林建筑、歌舞乐伎、书法绘画、驿传运输、佛道思想等相结合，在两个学科或多个学科的交叉点、边缘带，寻找文学研究的突破口与新增长点，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唐代文学研究已不再仅仅是古代文学中的一段，而且成为整个唐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网络技术为标志的数字化革命，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小试牛刀，《全唐诗》与《全唐文》光盘版与电子检索系统，包括两《唐书》在内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软件等的问世，不仅给古籍整理提出了新课题，而且为唐代文学研究指出了向上一路；以各种专业网站和电子学术期刊为代表的新媒体，又为学术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形式。逐渐落潮的有关新方法、新观念之争，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摆脱各种羁绊，从意识形态中淡化出来的文史学科渐臻独立，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门类。简言之，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特色，已构成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其中的观点与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后来者没法绕开这座高山，不能无视其存在。

由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辉煌，导致另外一种看法的流行，即认为本领域几乎所有问题都已被解决或涉及，一些硕士、博士论文或专题研究的选题，或上溯魏晋南北朝，或下行宋元明清，尽量跳出唐代以避免选题雷同撞车。还有一些颇具才气的学人已开始学术大转移，迁徙到学术力量薄弱的断代以图重大突破。有人甚至公开宣称：唐代文学领域经过文史大师陈寅恪、岑仲勉等的精耕细作，已无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每一块版图都插有标志，表明先行者的占领和所有权。

笔者承认论者所述部分属实，但不敢苟同全部观点。以笔者私见，唐代文学研究结束了圈地淘金的早期开发阶段，才刚进入有序规范的中后期发展。因为有早期文献整理的基础和学术史积淀，摆脱各种非学术的干扰和影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始得以展开^①，体大思精、牢笼百代的学术巨著仍有俟来日。换言之，二十一世纪更需要一批能会通古今、融合中西的学人，本领域呼唤新世纪学术大师的出现。在较早独立自觉、成熟发达的唐研究领域，严谨认真的学者仍将会大有作为。

一、本书所拟讨论问题的设定

在古代文学研究（包括唐代文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提出和强调在当下尤显重要。没有提出问题或提出的是伪问题，研究必然无法深入，更谈不到原创性成果或在既定条件下层累出新的高度。本着这样的认识，反观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笔者发现空白处、冷寂处、被人歪曲误解处、不当耕耘

^① 董乃斌先生亦有类似的想法：“通过对学术史的系统反思，我更深深感到百年来的文学史编写受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影响巨大，这影响可分正负两方面。简言之，正的方面是使中国建立了文学史学科，并且很快走上了现代化的路程；负的方面则是由于西方近代纯文学观的笼罩，不免使许多文学史家程度不等地忽略或弃置了中国文学的固有特征，割舍了一些传统的文体，造成所写的文学史在完整性与真实性上往往有所欠缺，这一点在唐代文学史上表现得也颇为明显……这样想来，唐代文学研究的路径就不是越来越窄而是很开阔漫长了，研究课题当然也就会很丰富多样。”见陈飞《唐代试策考述·董乃斌序》，中华书局，2002年。